

走近鲁迅
由崇拜到对话

张中良 著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走近鲁迅

由崇拜到对话



张中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鲁迅：由崇拜到对话 / 张中良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0

ISBN 978 - 7 - 5201 - 1589 - 6

I. ①走… II. ①张… III. ①鲁迅研究 IV.
①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0259 号

走近鲁迅

——由崇拜到对话

著 者 / 张中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张倩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 数：32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589 - 6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引言	1
----------	---

• 文。本。解。读 •

《呐喊》：启蒙之声	9
《孔乙己》细读	28
《彷徨》：灵府剖析	39
《故事新编》：古今穿越	61
《野草》：明暗之际	76
《朝花夕拾》：溯源汲泉	91
鲁迅杂文观的缘起、脉络与背景	97
鲁迅杂文的视野与深度	115
鲁迅杂文的审美特色	134

• 民。国。史。视。角 •

鲁迅笔下“中国”的歧义	153
-------------------	-----

鲁迅世界的多重民国影像	173
鲁迅对 1930 年代左翼文学的评价问题.....	189
鲁迅对 1930 年代自由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	202
鲁迅对 1930 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问题.....	214

• 比。较。文。学 •

鲁迅与泰戈尔	237
鲁迅与有岛武郎	
——以“爱”为中心	252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世界的遇合	268
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	289
在痛苦与挣扎中永生	317
丸尾常喜的鲁迅研究	320
《鲁迅探索》中译本序	332
后记	335

引言

最近一次的本科生学术讨论题目由学生定为“我的鲁迅观”，同学们从小学读《朝花夕拾》说到中学时代对鲁迅的种种印象，其中也言及中学生中的俏皮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做作文、三怕周树人”，最后自然说到当下读到本科二年级时对鲁迅之深邃与复杂的新认知。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对鲁迅的认识尚且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何况已逾花甲之年的我。

究竟何时何处何因知道鲁迅，现在竟然记不起来了。最初给我深刻印象的，还要说是“文革”时期。那时整天价喊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横扫一片，唯一留下的只有鲁迅。对鲁迅当然也有选择，报纸上流行的是“痛打落水狗”“横眉冷对千夫指”等锋芒毕现的警句，教材里选进的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火药味十足的杂文。那时我心目中的鲁迅形象，就是领袖称许的骨头“最硬的”三个“伟大”^①，写文章少不了去鲁迅那里寻章摘句，以增强战斗性。

但鲁迅也给我以温馨的慰藉。《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觉得鲁迅仿佛先知，说的不止于他自己，分明道出了天下所有命运跌宕者的心声。1969年1月一个酷寒的日子里，因那个年月的莫须有罪名，我家从城镇被赶回乡下老家，我变成一个不齿于人间的“狗崽子”。寄居在亲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杀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8页。

戚屋檐下，在感受到温情的同时，也难免体验轻蔑、歧视的寒意。在学校，有同学遇到难题找我，我毫无保留地伸出援手，可是得到的回馈却是夹杂着嫉妒的敌意。1971年九一三“副统帅”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之后，有了“批林批孔”运动，但凡运动就要上挂下联，可是，十几岁的中学生能有什么可以与“批林批孔”挂上钩的呢？终于发现我有几个同村的沾亲带故的小伙伴，放学一起走，课间也有时在一起交流——这不就是“小集团”吗？“小集团”与林氏“小舰队”岂不是一丘之貉！于是，我便加倍咂味到孤独的苦涩。

1973年，中学毕业后务农的第一年，我买了自己的第一本鲁迅作品单行本：《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至今记得这本集子的封面，左上方是鲁迅侧面头像，冷峻的面容上，嵌着目光深邃的眼睛。一位知青朋友问：“你能看懂吗？”我不敢说全能看懂，但我的确与这本书产生了深深的共鸣。《题辞》的第一句就让我感到亲切：“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当我的人格尊严受到践踏时，我觉得胸中冲撞着岩浆一般的话语，可如果真让我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又能够说些什么。“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我在生活中就有沉重的原罪感，无论怎样努力，都感觉不到解脱的轻松。我那时对基督教不甚了然，对耶稣更谈不上信仰，但看到《复仇（其二）》里的耶稣在四面的敌意、辱骂、戏弄、讥诮中被他所献身的人们钉在十字架上，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楚与悲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当年与其唤起共鸣的裴多菲话语，此时于我心有戚戚焉。无论怎样为高压、欺侮而战栗，无论前路还有多少荒凉破败的丛莽，我都要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执着前行。

1978年初春，我走进了位于长春市解放大道的吉林大学。我的中学理科老师，不止一位对我不选理工科表示惋惜，而我之所以选择中文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感念鲁迅在酷寒之际给我以温暖。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中国现代文学的任课老师是刘中树先生，后来我还上了刘中树先生的选修课“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先生循循善诱的教诲引导我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与现代文学史上认识鲁迅，我永远感念这位引我走上现代文

学研究之路的启蒙老师！在吉林大学，我还上过刘柏青先生的选修课“鲁迅与日本文学”，这门课开拓了我的眼界，为我后来赴日留学做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我本科三年级的学年论文题为《论阿Q的革命》，得到刘柏青先生的鼓励；学士论文仿照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写的是《〈阿Q正传〉人物谈》，遗憾的是自己基础薄弱，用功不够，我从刘柏青先生那里看到了失望的眼神。

本科毕业后，1982年2月，我从冰雪尚未消融的东北来到春雨霏霏的武汉，入读坐落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在毕奂午先生与陆耀东先生的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毕先生1930年代以诗歌登上文坛，曾在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掘金记》和《雨夕》，后来，政治的波诡云谲给他带来了重重磨难，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就有《野草》之《题辞》《秋夜》的解读。毕先生解读《野草》的诗性笔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毕先生说，鲁迅研究要想做得好，必须下苦功去读鲁迅读过的书，此言诚然有理，但我辈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却是不啻古时蜀道之难。陆耀东先生的鲁迅研究，一是关注鲁迅的思想演进，二是探究鲁迅小说的独创性，这些都给我以方法论的教益。

1985年2月，我到西北大学工作，被分配到鲁迅研究室。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张华先生，1957年被打入“右派”另册之后，长期在资料室工作，直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重新回到讲台。新时期再度高涨的杂文热潮，唤醒了张华先生自1957年便冬眠了的杂文热情，他一边在报刊发表出手不凡的杂文，一边策划组织中文系老师编撰学术史上第一部《中国现代杂文史》。我受命撰写“新文学第二个十年杂文概观”“鲁迅后期杂文”等四章，这给我系统地探寻鲁迅的杂文世界带来了契机。鲁迅研究室的工作之一是编辑与发行《鲁迅研究年刊》，我在蒋树铭主任和闫愈新主编的带领下参与这项工作，扩大了对鲁迅的认知视野。

1988年9月，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林非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林非先生在鲁迅研究、散文史、散文理论与散文创作等领域均有独创性的贡献，出版过的鲁迅研究著作有《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鲁迅传》（合著）、《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

义》、《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等。这些著作自然成为我研究鲁迅的入门书。林非先生主编《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吸收我参加，安排我撰写鲁迅的小说集、散文集、散文诗集与两部文学史著作的导读。林非先生的著述、授课，以及带领我们编校《鲁迅著作全编》、撰写导读的过程，引导我全面走进鲁迅世界。

我在博士论文通过答辩之后，于1991年4月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在丸尾常喜教授指导下从事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丸尾先生灵性的诗人感悟，把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方法引入鲁迅研究的方法论创新，使我眼界大开，在后来翻译丸尾先生两部鲁迅专著的过程中，我对其新颖与深邃体味更深。在日本短短一年，我还有幸聆听丸山昇先生的鲁迅研究课及伊藤虎丸教授、北冈正子教授、田仲一成教授等日本一流中国学学者的学术报告，后来，又通过与中井政喜教授的合作，与藤井省三、尾崎文昭等先生的交流，对日本学者的求是精神、实证功夫、思想史方法等有了深刻的感受。

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引导、同仁交流的促动与学术界成果的启迪之下，我在鲁迅研究方面一步一步探索前行。回顾起来，自己对鲁迅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单纯到复杂的过程。最初是火药味十足的时代共鸣，接着是苦闷中的朦胧慰藉，由此形成了衷心崇拜；在此认知与感情的基础上，无论是写作，还是讲授，都曾经是清一色的正面阐释，面对质疑与批评鲁迅的观点时，都持一种坚决捍卫鲁迅的立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解放种子的萌芽生根以及阅读面的扩大，尤其是近代史视野的打开，我对鲁迅的认识变得复杂起来。重要的转折发生在2006年4月前后，中国鲁迅研究会与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在广州举办“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我最初拟提交的论文题目为《鲁迅对于1930年代文学思潮的评价》，想把鲁迅对1930年代各种文艺思潮的评价做一次系统的梳理。可是，在准备过程中察觉到这个题目过大，因为鲁迅对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等都有不少论述，很难用一篇论文说清楚。尤其是把鲁迅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评价放回到1930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中去考察，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在鲁迅看来，民族主义文学不过是当局

的“宠犬”，它的兴起是为了“压迫无产阶级”，但因其属于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沉滓”，所以出笼不久即显出了“沉下去”的“运命”^①。然而，实际上，即使民族主义文学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也无法否认其归根结底是民族危机加剧的必然反映；因而并未在左翼文学的激烈抨击下顷刻瓦解，反倒逐渐壮大起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左翼文学一方面对其批判力度未减，另一方面奉献出表现抗日救亡主题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1935年问世的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典型例证。这一问题发现之初，我不禁感到震惊，但历史如此，史料俱在，学术研究只能实事求是。那么，以前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从方法论来看，是用鲁迅与其左翼战友当时锋芒毕现的杂文来证明鲁迅与左翼的正确性，就是“自证清白”；从历史观来看，以前的研究与叙述都是遵循新民主主义历史观，以此为标准，材料合则用，不合则舍。而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恐怕用更为宽广的民国史视角来观察更为有效，于是，我把论文题目改为《从民国史的视角看鲁迅》，而后又发表了从民国史视角研究鲁迅的系列论文。换一种视角看鲁迅，把单一政治视角下的鲁迅置于宽广的历史视角下重新审视，不仅使鲁迅从各种主观色彩强烈的政治阐释中走出来回到鲁迅自身，而且使之返回晚清到民国的历史现场，回到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近现代外国文化交汇的文化场域，这样必然会看到与以往的认知不尽一样的鲁迅。

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不仅是新文学、新文化的伟大创造者，而且是传统文学的杰出整理者与承传者、外国文学的出色译介者。鲁迅虽然少有西方思想家那样系统的理论著作，但他对中国历史的深邃透析，对国民性的洞幽烛微，对社会文化弊端的犀利批判，对中国现代精神建构的积极探索，足以当得起伟大思想家的光荣。对这样的伟大人物，我们自然应该爱戴、尊重，否则，正如郁达夫1936年10月24日在《怀鲁迅》中所说，“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

^① 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初刊于上海《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沉滓的泛起》，初刊于上海《十字街头》第1期，1931年12月11日。均收《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19~333页。

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①。但是，对鲁迅仅有热爱、尊重显然不够，还必须努力把握其整体，认识其内部矛盾，理清其与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传统的复杂关联，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认识鲁迅及其历史价值，才能有效地承传鲁迅精神遗产，充分发挥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才不至于辜负鲁迅的伟大贡献。这才是真正的爱戴与尊重。

作为一个对鲁迅作品有半个世纪阅读史的读者，一个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为职业的学者，我通过本书表达我对鲁迅的理解，呈现一个由崇拜到对话的认识过程。希望能对读者诸君认识鲁迅有所裨益，若有偏谬，自然欢迎批评与讨论。

^① 郁达夫：《怀鲁迅》，《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1日。收《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第162～163页。

走近 鲁迅

走近鲁迅
由崇拜到对话

文本解读

走近鲁迅

由崇拜到对话

- 《呐喊》：启蒙之声
- 《孔乙己》细读
- 《彷徨》：灵府剖析
- 《故事新编》：古今穿越
- 《野草》：明暗之际
- 《朝花夕拾》：溯源汲泉
- 鲁迅杂文观的缘起、脉络与背景
- 鲁迅杂文的视野与深度
- 鲁迅杂文的审美特色

《呐喊》：启蒙之声

1. 《呐喊》之前

1918年5月，当《新青年》第4卷第5号首次出现署名“鲁迅”的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之时，其激进而深邃的思想与卓异的表现形式固然引起同调者的共鸣，但“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憎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①。然而，随着《孔乙己》《药》《明天》等小说一篇接一篇地问世，敏感的读者不能不对“鲁迅”刮目相看了。等到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问世，便奠定了鲁迅的小说家乃至新文学主将的地位。

鲁迅的成功并非意外的幸运，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曲折的道路上跋涉了多年。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属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树人，字豫才。祖父周福清，字介孚，辛未科（1871）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任知县、教官、内阁中书。在这个书香门第里，鲁迅幼年的生括还算安宁，先后在家塾与三味书屋接受启蒙教育。但1893年周福清因科场案入狱，鲁迅的父亲

^① 沈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

周凤仪的秀才被革掉，从此家道中落。三年后，父亲病逝，作为长子的鲁迅品尝了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所遭遇的世态炎凉，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烙印。1898年5月，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管轮，10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1月以一等第三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南京新式学堂打开了他的视野，学习格致（物理、化学）、算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通过严复译《天演论》等接触到进化论等西方人文精神，并从《时务报》等报刊中受到维新思潮的熏陶。

1902年3月，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鲁迅赴日本留学，4月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1904年4月结业。同年9月考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方面是想要借助西医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庸医所误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另一方面因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想借此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①。以鲁迅的聪颖与用功，从第一学年所取得的成绩来看，顺利毕业当不成问题，但是，种种缘故却使他中断了医科学业。1904年2月8日爆发的日俄战争，1905年9月以日本取胜告终。日本战争宣传机器高速运转，煽动起日本民众狂热的战争热情，日本打败强大的沙俄，自信确立了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达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滋生出盲目的民族自大情绪。每逢日军取得一次胜利，古朴的仙台小城必被喧嚣的祝捷会、提灯游行所扰攘，幽静的仙台医专势难幸免，回荡着欢呼的声浪。沉浸在战争狂热与胜利喜悦之中的日本人完全忽略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备受伤害的心灵。正是在日俄战争背景下，鲁迅位于中等的考试成绩受到一些日本学生的无端怀疑，虽然事情很快就被澄清，流言不消自灭，但鲁迅的委屈与愤慨可想而知。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厮杀争利，使备受蹂躏的中国蒙羞，人民遭难；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占据了支配地位，为日后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这一切怎能不让中国学子激愤满腔？中国留日学生3000余人联名向清政府军机大臣发出反对《朴茨茅斯条约》的抗议电报。8000余名东京留日学生于1905年12月4日开始实行总罢课，反对日本文

^① 参照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7~442页）、《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3~86页）等。本书所引鲁迅作品均据《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在此一并说明。

部省 11 月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陈天华于 12 月 8 日在横滨海湾愤而蹈海自杀，留下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时在东京度假的鲁迅，踊跃参加这场留学生爱国运动。1906 年 1 月新开细菌学课，课上放映的日俄战争幻灯片里，一个据说是替俄国做了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砍头，而一群中国人围观鉴赏，被杀者与围观者“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这给他以强烈的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①。课堂上日本同学的鼓掌欢呼，更加让鲁迅忍无可忍，他毅然决然地于 1906 年 3 月从仙台医专退学，到东京去寻找志同道合的同胞，从事文艺运动。

东京是中国革命党人的海外活动中心，鲁迅留学之初就深受民族民主革命氛围的感染，课余常赴会馆，往集会，听讲演。1903 年 3 月，他剪去发辫，摄“断发照”，作《自题小像》^② 抒发爱国情怀：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他参加了光复会的筹备工作，后列名为会员，接受陶成章的委托，保藏过光复会的机密文件。但他从事的主要是精神文化工作，还是在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时，他就于 1903 年 6 月 15 日开始在《浙江潮》第 5 期上发表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与雨果《哀尘》的译文。而后，相继出版《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等译著与《说鈆》及《中国地质略论》等科学论文，弃医从文后全身心投入文艺运动，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论文。

但文艺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计划中的《新生》杂志未能如愿面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只印行了第一、第二册，因销行寥寥而中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38 ~ 439 页。

^② 《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447 页。

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后来回味起这种“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① 寂寞，感到莫大的悲哀。为了维持家庭生计，鲁迅于 1909 年 8 月归国。留学期间，尽管倡导文艺运动的宏愿未能实现，但鲁迅在思想、语言与文学等方面收获很大。20 世纪初，日本相继兴起的尼采热、易卜生热、托尔斯泰热，给鲁迅提供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资源；夏目漱石等人对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思考引起了他的共鸣；日语的精通及德语等外语的粗通为他直接从外国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文学翻译创造了条件；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为其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文化建设思路^②，也都在此时基本确立。

回国以后，他先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绍兴府中学堂生物学教员及监学、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1912 年 2 月，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5 月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先后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等职。因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局面失望，且新文艺的时机尚未成熟，鲁迅于公余时间抄古碑，辑录、校勘古书，搜集、研究金石拓本，翻译一些社会教育、儿童教育等方面的论文，并研究佛学思想。

在这段创作与翻译的沉潜期，鲁迅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其唯一的文言小说《怀旧》，刊登在 1913 年 4 月 25 日《小说月报》第 4 卷第 1 号，署名周逴。这篇作品写于 1911 年冬，辛亥革命之后，以儿童的视角描述塾师秃先生、左邻金耀宗等众生相。金耀宗本是聪慧不及看门人、性格唯唯诺诺、靠父母生活的“出窝老”，但因其家拥巨资且为防“无后”之“不孝”而在二十一岁时就急切蓄妾三人，便赢得了只蓄妾一人的秃先生的敬重。秃先生懂《论语》而“智慧胜”，不似金耀宗只知“长毛”（指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39 页。

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57、58 页。